

银税互动提升小微企业税收遵从

彭凡嘉 吴斌珍 杨龙见 李世刚*

摘要: 如何良性提高小微企业税收遵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银税互动强调以增加银行贷款的方式来奖励纳税信用良好的企业,彰显了“以奖代罚”的崭新理念。本文发现:银税互动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且对政策力度更强地区、纳税信用非 A 级、规模更小、融资约束更强和民营的企业效果更显著,这表明“以奖代罚”在促进企业税收遵从上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 小微企业;税收遵从;银税互动

DOI: 10.13821/j.cnki.ceq.2026.02.15

一、引言

如何有效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传统应对策略主要聚焦于增强税务系统的征管能力,即通过加大“罚”的威慑力来促使企业遵规守法。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税务审计和稽查工作、严厉打击税收违法行,为企业“不敢逃”;同时,利用信息化征管技术和引入第三方信息等手段,全面掌握纳税人的真实涉税交易情况,使企业难以虚报收入或成本,从而“不能逃”。然而,这种强征管模式往往伴随着高昂的征管成本。对于数量众多但单个税收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而言,其征管成本很可能超出征管收益。在征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往往会理性地选择减小对小微企业的征管力度,而深知这一点的小微企业则因此有了更强的逃税动机。这正是小微企业税收遵从问题成为各国税务部门棘手难题的核心原因之一。

“以奖代罚”的理念,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这一创新策略着重于通过奖励那些良好的纳税行为,激发企业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的热情,促使企业从“不敢逃、不能逃”的被动状态,转变为“不愿逃、主动交”的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一

* 彭凡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斌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杨龙见,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李世刚,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李世刚,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国际金融学院,519082;电话:15084775705;E-mail:lishigang@sysu.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373173、72073079、72373168)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转变标志着税收征管从“刚性执法”转向“柔性服务”，不仅有效降低了征管成本，还促进了征纳双方和谐关系的塑造，为良性税收征管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以奖代罚”策略实施的最大瓶颈在于奖励资金的筹措。若奖励资金来源自政府财政，往往需要通过提高其他税收收入来弥补，这无疑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

由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现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开展的“银税互动”政策（以下简称银税互动），为以奖励机制促进企业税收遵从的理念提供了新的可行方案。该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将沉淀在税务机关的企业纳税信息共享至银行，银行据此设计创新的贷款模型，巧妙地将企业的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那些诚信守法的企业发放信用贷款。换言之，这一政策旨在将政府积累的纳税信用共享给市场主体，激励它们深入挖掘该信息的市场价值，并以实际行动奖励企业的良好纳税行为，从而激发企业主动纳税的积极性。这一制度设计，不仅从根本上激励企业自觉遵从税法，而且在未增加征管成本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企业的逃税动机，实现了“以奖促信”的初衷。同时，通过与市场利益相关方共享政府信息，激发了市场对企业良好行为的奖励机制，有效缓解了政府的资金压力。事实上，银税互动政策的出台，其初衷是构建一个“企业—银行—税务机关”三方共赢的良性生态，确保银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企业获得亟需的贷款、税务机关则得以确保税收的稳定增长。这一制度构想，无疑是思路转变与创新改革的典范，充分展现了政府与市场有机协同、相互促进的全新理念与实践探索。

然而，该制度在现实中能否有效提升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仍是一个亟待实证检验的问题。倘若银税互动政策未能显著改善企业的税收遵从状况，税务机关将难以从中获得应有收益，进而缺乏持续共享纳税信息的动力。在奖励机制的有效实施方面，即银税互动政策是否确实对纳税信用良好的小微企业给予了实质性的奖励，杨龙见等（2021）的研究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从实证角度充分证明了，银税互动政策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实现了“银行有信息”“企业有贷款”的愿景。然而，尽管西晓楠（2023）指出银税互动政策能提升企业的依法纳税意识，但目前仍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来支撑。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2—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国家税务总局企业纳税信用数据库，借助银税互动这一准实验，构建了实证模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银税互动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产生了显著正面影响，上述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银税互动政策在推广力度更强的地区、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和政策前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其税收遵从度的提升幅度更大；我们还发现，银税互动政策对规模更小的企业和民营企业税收遵从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综上所述，银税互动政策提升了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税务机关在此过程中获得

了相应的收益。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是目前少有的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税收遵从实证研究。小微企业作为税收的重要贡献者,其税收遵从度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提升(Slemrod, 2019),且鲜有文献专门关注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问题。一方面,由于数据获取限制,国内外针对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实证研究尚显匮乏(Adhikari et al., 2021);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靠的外生冲击,无法识别精确的因果效应。本文填补了小微企业税收遵从实证研究领域的空白。第二,本文对柔性税收征管手段,特别是“以奖促信”如何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文献进行了重要补充。相较于税务稽查、数字化征管等强制性税收征管手段,柔性税收征管手段能够缓和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使税收征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猫抓老鼠”游戏模式。本文从实证角度填补了银税互动政策对小微企业税收遵从影响评估的空白,为这一新构想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第三,“银税互动”作为政府部门协同治理的典型案列,全面评估其对企业、税务机关和银行三方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银税互动对于信贷的影响(陈彪等,2021;杨龙见等,2021),重点聚焦于银行和企业双方,鲜有文献探讨“银税互动”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税收缴纳行为。本文则提供了税务局端的证据,支持了银税互动政策中“企业—银行—税务机关”三方共赢的制度设想。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完成了银税互动政策全面评估的最后一环,为这一政策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有必要强调,无论是基于“威慑”理念的现代化征管技术,还是秉持“奖励”原则的银税互动项目,两者都高度重视大数据的运用,但其核心思路却截然不同。前者侧重于税务机关利用大数据手段,有效缩减税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精细的交叉比对,精准筛选出存在税务风险的企业,其重点在于监管和惩罚,以威慑力促使企业遵守税收法规。而后者,则旨在增进市场、企业和税务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向市场开放数据信息共享,让信息在市场中自由流通,从而充分发挥其市场价值,使各方主体均能从中受益。其核心在于减少信贷市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促进金融机构的业务蓬勃发展。同时,市场竞争机制会激励金融机构将这份市场价值传递给企业,转化为对企业实实在在的奖励。换言之,这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奖励企业的合规行为,引导企业自觉纳税、合规经营。

二、文献综述

本部分首先回顾基于传统思路的两类税收遵从文献,第一类关注稽查与威慑等税收执法手段的影响,第二类则强调税收信息化建设在税收遵从中起到的

作用；其次介绍以柔性征管手段促进企业税收遵从的最新研究进展；最后，对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评述。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强调稽查和威慑等税务执法手段的作用。诸多研究表明，税务检查(tax audit)对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发挥着重要作用(Alstadsæter et al., 2022; Bergolo et al., 2023)。^①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纳税人的行为调整会对税务检查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并且税务检查带来的正面效应往往难以持久存在(DeBacker et al., 2018; Advani et al., 2023)。Advani et al.(2023)研究了税务检查对长期税收遵从的影响，发现经检查的纳税人在未来5年内都会提高纳税额度，但这一效应仅限于在随机检查中被发现有问题的纳税人。DeBacker et al.(2018)的研究发现，税务检查能够增加接下来几年纳税人的缴税额，但在缺乏第三方信息支持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的持续时间相对有限。同时，对于那些应对税务检查经验丰富的纳税人而言，税务检查所带来的影响微不足道。

给企业发送威慑信息则是另一种成本较低的做法。一系列的随机试验表明，相较于没有收到威慑信息的纳税人，收到威慑信息的纳税人遵从度显著提高，这一结论在阿根廷、美国和一些非洲国家都得到了验证(Castro and Scartascini, 2015; Shimeles et al., 2017; Meiselman, 2018)。但是这些威慑信息并不是对所有纳税人都有作用。一方面，纳税人在收到同伴企业的信息后，会更新自己对于税务机关的判断，税收遵从度反而可能会出现下降(Castro and Scartascini, 2015)。另一方面，税收执法能力会影响威慑信息的效果。Carrillo et al.(2017)在厄瓜多尔开展随机实验，对部分纳税人的逃税行为发出通告，结果发现由于当地税收执法能力不足，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对通告做出回应。此外，Kleven et al.(2011)发现小范围内通知的威慑可以置信，但如果威慑涉及群体范围较大，考虑到税务机关的资源有限，这种威慑就会变得不可信，理性的纳税人不会对这种威慑做出反应。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强调信息的挖掘和应用。在传统的稽查和威慑手段外，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始加强征管信息化建设，试图利用第三方信息和风险管理系统精准识别税务风险(Pomeranz, 2015; Naritomi, 2019; Lobel et al., 2024)。Pomeranz(2015)针对智利企业的信函随机实验表明，第三方信息和威慑效应的结合能够有效增强企业税收遵从。Naritomi(2019)针对巴西圣保罗的一项消费者奖励计划研究发现，当引导消费者索取购买凭证后，企业的报告收入在4年内增长超过21%，最终税收增长了9.3%。有奖发票(田彬彬等, 2021)、个人所得税抵免(Buettner et al., 2023)等举措也都可以有效鼓励消

^① 国外对于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现场执法的征管手段一般称为“tax audit”，直接翻译过来为“税务审计”，这一概念在国内相对应的是税务检查和稽查。

费者索要发票,进而提升企业税收遵从,但这些都需要财政进行补贴,会增加企业负担。

尽管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第三方信息获取以及数字化办税等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方式在税收遵从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克中等,2020; Mascagni et al., 2021; Bellon et al., 2022),但企业税收遵从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Slemrod et al., 2017; Mascagni et al., 202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第三方信息挖掘或者信息化建设对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有限。一方面,小微企业大部分处于下游,面临的是终端消费者,当消费者缺乏索要发票的激励时,税务部门无法获取信息,导致小微企业成为整个税收征管工作的薄弱环节,削弱了“以票控税”和“以数治税”等税收征管工作整体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数字化税收征管模式仍极大地依赖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大部分纳税人自愿的税收遵从,比如主动按期申报纳税、计算税额和缴纳税款等。相较于大企业,小微企业用于实现税收遵从的专业财税资源较少,数字化办税能力较弱,遵从成本相对较高。不仅如此,这些手段还带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占用,包括纳税人为了躲避税务机关监管的成本、第三方信息的获取成本、税务机关打击逃税的成本等。面对这些状况,无论是增加税务机关的人员配置、税收信息化建设,抑或是提高税收稽查力度,都将耗费巨额的资源与精力,其成本和收益往往不成比例。因此,对于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群体而言,采用奖励手段来提升其税收遵从度显得尤为必要。

与本文相关的第三支文献是柔性征管策略。相较于税务稽查等刚性手段往往让纳税人感受到纳税是一种“不得不”的义务,柔性征管策略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一策略涵盖了道德劝说、法律宣传以及强调税收的互惠性等多个维度,旨在强调纳税是一种“应当履行”的公民责任。虽然这些举措在实践中常被使用,但大部分的证据表明,没有强制性的税务措施干预时,这些策略对税收遵从的提升几乎没有影响(Slemrod et al., 2001; Castro and Scartascini, 2015; Bott et al., 2020; Bérigolo et al., 2023)。以 Castro and Scartascini (2015)的实验为例,强调互惠或同伴效应的信息对于纳税人遵从度没有显著影响。另一项由 Bott et al.(2020)在挪威开展的随机试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研究发现道德劝说几乎不影响纳税人的遵从度。

与本文相关的第四支文献是企业的税收遵从及其经济后果。一些学者探讨了纳税门槛设定所引发的经济成本,指出由于合规成本的考量,企业往往会采取减产、隐瞒收入等手段,这一行为导致了税基流失和效率损失(Keen and Mintz, 2004; Asatryan and Peichl, 2017; Harju et al., 2019)。一方面,税务机关对大企业的监管力度更强,这反而促使一些大企业选择“伪装”成小企业(Almunia and Lopez-Rodriguez, 2018),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税收流失。另一方

面,这种“抓大放小”的税收征管策略,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造成了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比如,Bachas et al.(2019)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美国的税收征管强度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取消这种基于规模的征管力度差异时,社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提升1%—2%。由此可见,提高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有诸多益处。然而,如何有效提升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却鲜有文献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本文着眼于银税互动这一全新的制度设计,旨在评估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力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制度背景

银税互动政策是中国政府在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倡导数据共享的大背景下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出的一个全新尝试。银税互动的整体政策思路是推进税务部门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将税务部门的纳税信息融入银行的信贷发放过程,降低银行与小微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鼓励银行向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发放基于税务信息的信用贷款,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2015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的通知》(税总发〔2015〕96号,以下简称96号文),明确提出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将辖区内小微企业的相关纳税信息推送至银监分局,再由银监分局发送至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且要求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定期反馈已推送纳税信息企业的融资情况,并由银监分局将相关信息共享至同级税务机关。96号文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在2015年第3季度建立银税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在2016年1月底前将相关工作进展上报至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2015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拓展“银税互动”活动的意见》(税总发〔2015〕156号,以下简称156号文),进一步要求税务机关切实推动银税互动相关工作的开展,同时指出支持银行业企业在运用纳税信息向守信企业提供信用贷款的同时,同步推进对失信企业给予信贷限制,形成正向褒奖和反向限制的双向合力,促使纳税人诚实守信。

在经历了初期的制度探索后,银税互动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拓宽银税互动政策的惠及群体,2017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银税互动”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7〕56号,以下简称56号文)。56号文中明确提出要加大银税信息交流力度,要求税务机关推送的企业名单覆盖A—D级全部纳税人,同时将推送信息种类从税务信息进一步拓宽至非税信息;规定银行应当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查询纳税人银行账户相关信息,为税务机关税收管理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来看,银税互动政策是将政务信息共享机制融入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一次新的探索。银行将沉淀在税务机关的纳税信息融入信贷产品发放流程,将企业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减少了银企间的信息壁垒,在发放信贷产品时拥有了更多决策参考依据;企业则通过真金白银的纳税“硬信息”换取银行的信贷融资支持,实现了“以税增信”;税务机关则通过银行对守信企业发放贷款的激励,获得了企业的诚信纳税,提高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这种“企业—银行—税务机关”的三方共赢政策,无疑是打破了以往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传统支持小微企业的“单向输血”模式,为政府服务于小微企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局面提供了更多有益思路。

(二) 理论分析

银税互动政策的直接效应是鼓励银行为纳税信用良好的纳税人提供信贷支持,为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关于银税互动对于小微企业信贷增长的研究,陈彪等(2021)和杨龙见等(2021)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银税互动能够增强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缓解小微企业的信贷约束。本文中,我们所使用的样本无法直接验证企业信贷增长情况,但我们仍提供了一些银税互动政策提高企业信贷可得性的间接证据。^①

我们接下来分析银税互动的信贷激励如何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在经典的Allingham-Sandmo逃税模型(以下简称AS模型)中,企业的逃税收益是减少的资金支出,成本是被税务机关发现并处罚导致的收益下降(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企业会权衡成本收益,进而选择最优的逃税额度。陈彪等(2021)分析了银税互动情况下企业逃税的成本收益权衡:一方面,逃税减少了企业的资金支出,增加了企业的实际利润,这部分是企业的逃税收益;另一方面,企业逃税降低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与额度,进而带来投资的下降和企业价值降低,这部分是企业的逃税成本。在银税互动相关的贷款产品中,信贷额度通常以企业纳税额度为参考,最高发放贷款额度理论上可以达到企业纳税额度的数倍,企业缴纳税款换来的最高信贷额度要远高于税款数额本身。^②当税款的乘数效应越大时,企业诚信纳税的激励越强,逃税动机越低。

结合AS模型和陈彪等(2021)的研究可以看出,银税互动政策为企业逃税行为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具体而言,在原有的AS模型下引入银税互动政策后,企业的逃税收益不变,但逃税成本除原有被税务机关发现并处罚带来的成本之

^① 详细说明请参见附录I。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② 我们针对国内某家商业银行的银税互动信贷产品做出了更为详细的介绍,详细说明请参见附录II。

外,还增加了逃税带来银行贷款下降进而导致企业价值降低的成本。基于此,银税互动政策会导致企业的逃税动机下降。不仅如此,从资金净流入的角度看,逃税减少、缴税额度增长带来的现金净流出要小于从银行获取贷款的现金净流入,因此诚信纳税最终会使得企业总资金流增加。在小微企业普遍融资难的大背景下,很多小微企业都有获取银行信贷的需求,因此银税互动政策应当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度。在银税互动的信贷产品中,信贷额度的计算依据通常为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和,因此在银税互动政策实施后,企业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大主要缴纳的税种上的遵从度均会有所提升。

在实践中,银税互动政策是否真的能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水平并不确定。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同时,银税互动政策可能会因为企业所处地区、行业,以及自身的特征差异而产生差异化影响。理清这些问题,对于银税互动政策未来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工作。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一) 变量测度与研究设计

1. 逃税程度的测度

逃税是企业自身做出的决策,且企业没有动机如实告知自己的逃税行为,因此现有文献仅能采用间接方式对企业的逃税行为进行测度(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现有的逃税测度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账税差异(book-tax difference)、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 ETR)和利润瞒报程度。账税差异指的是企业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Wilson(2009)认为当企业逃税程度越高时,企业账税差异会越大。尽管账税差异法使用已经较为广泛,但是当样本为非上市公司时账面收入无法获得(Cai and Liu, 2009),因此本文无法直接采用账税差异法来进行度量。

有效税率是以税收支出与应税收入的比值作为逃税的代理变量,给定法定税率,有效税率越低则意味着逃税程度越高。有效税率的缺点在于无法使用单一指标衡量企业综合税收遵从度。因此基准回归中本文不采用上述指标,后文分析中我们将引入该指标作为企业不同税种税收遵从行为的辅助分析。

Cai and Liu(2009)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的思路。其原理是利用国民收入核算的收入法计算企业的推算利润,与实际报告利润进行比较,用两者相关性的变化来度量企业逃税程度的变化。两者的相关性越低,意味着逃税程度越高。受限于篇幅,在附录Ⅲ中我们介绍了该文构建逃税指标的详细步骤。

2. 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 Cai and Liu(2009)的方法对企业逃税程度进行测度,并借助

2015年96号文这一准实验来评估银税互动对小微企业逃税程度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RPRO_{i,t} = (\beta_0 + \beta_1 BTI_{i,t} + \sum_{j \geq 2} \beta_j X_{i,t}^j) PRO_{i,t} + \alpha_0 + \alpha_1 BTI_{i,t} + \sum_{j \geq 2} \alpha_j X_{i,t}^j + \theta_{j,t} + \theta_{k,t} + \mu_i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PRO_{i,t}$ 是企业 i 在 t 年的报告利润。 $PRO_{i,t}$ 是企业 i 在 t 年的推算利润, 根据 Cai and Liu (2009) 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出。 $BTI_{i,t}$ 是银税互动政策交互项, 具体定义为 $BTI_{i,t} = Treat_i \times Post_t$ 。 $Treat_i$ 是政策虚拟变量。 $Post_t$ 为政策时间虚拟变量。在这一设定下, β_1 度量了银税互动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如果 β_1 的系数显著大于 0, 则说明银税互动政策实施后企业报告利润与推算利润间的相关性更强, 税收遵从度上升。

下面详细介绍 $BTI_{i,t}$ 的具体构造。先看 $Post_t$ 的设定。96号文规定“各地(市)国税局、地税局和银监分局要在2015年第3季度内建立银税合作联席会议制度, 各省(市)国税局、地税局和银监局要于2016年1月底前将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分别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 因此落实到各级税务机关和银监分局的截止时间是2016年1月。援引作者在地方金融管理局调研得到的答复, 银税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银行—税务机关”合作关系的全面铺开(杨龙见等, 2021)。因此本文将政策冲击时点定义为2016年。2016年及之后为1, 2016年之前为0。

再看 $Treat_i$ 的设定。政策文件(96号文)规定仅将税务局管辖下的小微企业信息进行共享。在税务局管理的口径下, 小微企业被定义为“小型微利企业”, 且只有当资产总额、雇员人数和应纳税所得额这三个指标均低于门槛值时, 才能被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本文在附录IV中详细梳理了2012—2018年的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标准, 可以发现2012—2017年间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标准整体保持稳定, 仅在2017年将应纳税所得额门槛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而在2018年则发生了较大变化, 将应纳税所得额门槛从5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万元。本文采用前定变量的形式, 将政策前一年(即2015年)企业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准作为划分依据, 将小型微利企业作为处理组, $Treat_i$ 设置为1, 其余企业作为控制组, 将 $Treat_i$ 设置为0。

$X_{i,t}$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包含了企业规模($Size$, 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杠杆率(Lev , 以资产负债率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率($Fixasset$, 以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资产收益率(ROA , 以当年净利润与总资产比值衡量)。为缓解内生性问题, 除当年净利润外, 本文的控制变量均采用企业年初申报值。 μ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theta_{j,t}$ 和 $\theta_{k,t}$ 分别为省份—年份、行业—年份交互项固定效应。 $\epsilon_{i,t}$ 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的纳税信用评级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官网,企业数据来自2012—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基于分层抽样设计,通过向企业发放税收调查表的方式收集得到。税收调查表的设计方式参照了企业纳税申报表,全面覆盖了企业的税务信息和财务信息。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丰富的财务信息让本文能够计算企业的税收遵从指标,而详细的分税种申报信息则能够帮助本文分析不同税种的遵从行为。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如下清洗:(1)删除纳税人识别号填报错误的企业;(2)删除小型微利企业判定标准阈值上下10%的企业;(3)对关键变量进行截尾处理,减轻异常值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企业增加值变量未纳入统计,因此本文无法对2015年企业的逃税程度进行测算,基准回归中不包含2015年的数据。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请参见附录V。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重点关注银税互动对小微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表1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中的回归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BTI \times PRO$ 的系数为0.016,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2)列的回归中,我们将年份固定效应增强为年份-省份、年份-行业交互固定效应, $BTI \times PRO$ 的系数基本不变;第(3)列进一步加入企业控制变量, $BTI \times PRO$ 的系数下降为0.007,但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第(3)列的回归设定作为基准,企业报告利润与推算利润的相关系数为0.024,由此可得银税互动政策使得企业逃税程度下降了29.2%($0.007/0.024 \times 100\%$)。从上述结果来看,银税互动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税收遵从,且在加入更严格的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后,本文的基准结果保持稳健。

表1 银税互动与小微企业税收遵从

	<i>RPRO</i>		
	(1)	(2)	(3)
<i>BTI</i> × <i>PRO</i>	0.016***	0.015***	0.007***
	(0.003)	(0.003)	(0.002)

(续表)

	<i>RPRO</i>		
	(1)	(2)	(3)
<i>BTI</i>	0.007*** (0.001)	0.007*** (0.001)	0.000 (0.001)
<i>PRO</i>	0.054*** (0.002)	0.056*** (0.002)	-0.002 (0.004)
<i>Size</i> × <i>PRO</i>			0.003*** (0.001)
<i>ROA</i> × <i>PRO</i>			-0.145*** (0.007)
<i>Fixasset</i> × <i>PRO</i>			-0.026*** (0.004)
<i>Lev</i> × <i>PRO</i>			-0.002 (0.002)
<i>Size</i>			0.001** (0.000)
<i>ROA</i>			0.609*** (0.005)
<i>Fixasset</i>			-0.006*** (0.002)
<i>Lev</i>			0.008*** (0.001)
Constant	0.019*** (0.000)	0.020*** (0.000)	-0.006 (0.005)
企业 FE	是	是	是
年份 FE	是		
年份-省份 FE		是	是
年份-行业 FE		是	是
观测值	498 172	498 172	498 172
R ²	0.588	0.591	0.858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下统计意义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如无特殊注明，下表同。

(二) 事前趋势检验与政策动态效应

本文进行政策评估的前提是,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银税互动政策影响的动态变化,以检验银税互动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升是否有持续的效果。参考 Roth(2022),本文采用下述回归模型进行事件研究法分析:

$$RPRO_{i,t} = \sum_{-4}^2 \gamma_m Treat_i \times D_m \times PRO_{i,t} + (\beta_0 + \sum_{j \geq 2} \beta_j X_{i,t}^j) PRO_{i,t} + \alpha_0 + \alpha_1 BTI_{i,t} + \sum_{j \geq 2} \alpha_j X_{i,t}^j + \theta_{j,t} + \theta_{k,t} + \mu_i + \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D_m 为虚拟变量,当距离政策时点为 m 年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将2014年选取为基期^①, γ_m 即为本文所关心的各期相对于基期的动态效应大小。控制变量、固定效应与标准误设定与式(1)保持一致。

图1展示了事件研究法的回归结果,圆点为各期的估计系数,代表政策动态效应大小,竖线上下段为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可以看出,在银税互动政策开展前,各期系数置信区间均跨越0值,未能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在政策推开后的各年,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银税互动开展后,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出现了明显上升,且这种政策效应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这说明银税互动政策对于提升小微企业税收遵从行为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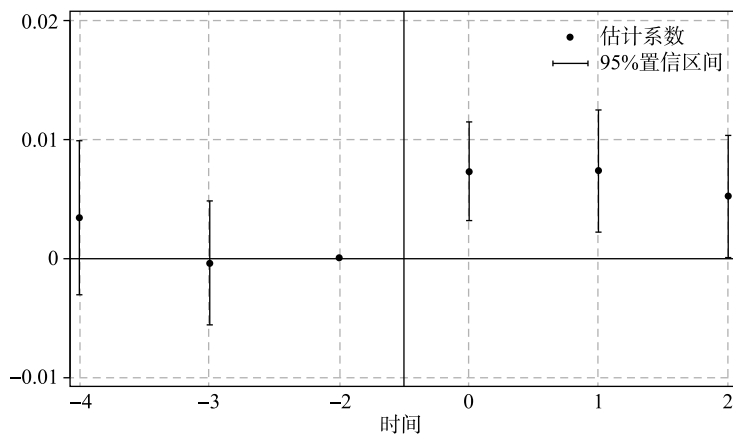


图1 事前趋势检验和政策动态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1. 排除同期税收政策冲击

为了排除样本期内发生可能影响企业税费的政策进而导致对税收遵从的

^① 如前文所述,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未统计企业增加值指标,无法计算2015年的企业避税程度,因此选取2014年作为基期。

影响,我们在附录Ⅵ中考虑了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营改增”和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冲击对结果的可能影响。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后,基准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2. 排除替代性假说

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银税互动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那么我们可能会观测到银税互动政策带来的两种效应。其中第一种效应是,小微企业在获得信贷后现金充裕度增加,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进而少逃税甚至不逃税(Law and Mills, 2015),这是银税互动信贷发放的直接效果。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观测到第二种效应,即银税互动政策推开后,企业发现主动提高税收遵从度后,良好的纳税信用更有可能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企业有动机减少自身逃税行为。这部分效应是我们想重点强调的银税互动政策的“以贷促信”的激励。我们在附录Ⅵ中采取两种方式检验了这一融资约束影响机制的替代性假说,结果证实第一种效应并非是本文估计结果的主要驱动因素。

3. 分税种回归

我们在附录Ⅶ中考察了银税互动政策对不同税种税收遵从度的影响,发现银税互动政策后,企业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的遵从度均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银税互动政策显著降低了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申报不一致的情形,说明企业在收入端瞒报的可能性下降,即税收遵从度上升。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我们还在附录Ⅵ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删除大中型企业、更换聚类标准误、加入门槛值附近的企业等,基准结果保持稳健。

六、异质性分析

(一) 银税互动政策冲击强度

杨龙见等(2021)指出良好的纳税信用评级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银行贷款。那么当一个地区A级纳税人的比例更高时,当地银行获得的税务机关推送的企业名单会越多,相应的贷款发放量越大,政策力度越大。基于此,我们将政策前一年(2015年)县级层面的A级纳税人比例作为银税互动政策冲击强度的代理变量,按中位数进行分组,并将样本区间限制在2012—2016年,以避免2017年5月政策扩围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表2第(1)列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在银税互动政策初期开展力度较弱的地区,企业的税收遵从度没有明显变化。第(2)列是银税互动政策力度较强的地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述地区企业的纳税遵从度显著提升。第(3)列和第(4)列删除了A级纳税人样本,进一步排除税收遵从度的提升是由于A级纳税人获得了更多信贷支持,

进而融资约束缓解带来的税收遵从度提高这一替代解释。结果与第(1)列和第(2)列相比,几乎无变化。

(二) 纳税信用评级

在企业的纳税信息中,纳税信用评级是一个重要的评价维度。纳税信用评级为A代表在一定周期内企业在高质量履行各项纳税义务,是税务机关对企业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高度肯定。纳税信用评级为A意味着企业本身已经具有较高的税收遵从度,税收遵从度的提升空间相对于非A级纳税人更加有限,因此我们预计银税互动政策对非A级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在表2的第(5)列和第(6)列中,我们依据企业纳税信用评级是否为A进行了相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A类纳税人在银税互动政策开展后税收遵从度无显著变化,非A类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显著提升。

(三) 融资约束

银税互动政策发放的信用贷款主要是为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提供中短期资金支持。在银税互动政策冲击前,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资金流短缺更加严重,更加迫切需要银行信贷支持改善现金流。当银税互动的激励来临后,这部分企业由于获得银行信贷的意愿更加强烈,有更强的动机来增加税收遵从度换取更大额度的银行信贷支持。参考Almeida et al.(2004),我们将政策冲击前企业的“本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总资产”作为融资约束代理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现金流越充足,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我们将上述指标加总到两位数行业代码层面,以行业中位数分组,将大于等于行业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融资约束程度较弱的一组,小于中位数的定义为融资约束较强的一组,进行分样本回归。表2的第(7)列和第(8)列结果显示,融资约束较强的一组企业税收遵从度显著提高,而融资约束较弱的一组企业税收遵从没有明显变化。

(四) 企业规模

银税互动政策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同样可能会产生异质性影响。规模较小的企业,本身税收遵从度较低,融资约束也更为严重,这类企业通常更加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而又难以获得。在银税互动政策开展后,“以税换贷”为规模较小的企业提供了可行的银行信贷支持渠道,因此这类企业在政策实施后税收遵从程度的提升会更明显。基于此,本文将处理组企业按照资产规模三等分后进行分样本回归。表3的第(1)—(3)列汇报了规模由小至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对于资产规模较小和规模中等的两组企业而言,银税互动政策显著增加

了其税收遵从度;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银税互动政策对其税收遵从度没有显著影响。

(五) 企业所有制

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逃税动机更加强烈(Cai and Liu, 2009),并且对于各类激励政策,民营企业也会更加敏感。国有企业由于自身“预算软约束”等原因,不易对外部激励做出及时调整。在上述因素影响下,银税互动政策开展后,民营企业的逃税程度下降应当更为明显,国有企业则可能不会对该政策做出反应。表3的最后两列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银税互动政策推开后税收遵从度未发生显著变化,而民营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则出现了显著上升。

表2 银税互动政策异质性效应:第I部分

	RPRO							
	全样本		剔除A级纳税人		A类	非A类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
	政策力度弱	政策力度强	政策力度弱	政策力度强	纳税人	纳税人	较强	较弱
	(1)	(2)	(3)	(4)	(5)	(6)	(7)	(8)
<i>BTI</i> × <i>PRO</i>	0.005 (0.004)	0.012*** (0.003)	0.006 (0.004)	0.013*** (0.004)	0.001 (0.004)	0.007*** (0.002)	0.008*** (0.002)	0.003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省份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行业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39 113	194 065	131 073	143 943	73 859	424 298	340 122	124 887
R ²	0.863	0.874	0.862	0.864	0.897	0.852	0.855	0.869

表3 银税互动政策异质性效应:第II部分

	RPRO				
	规模较小	规模中等	规模较大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1)	(2)	(3)	(4)	(5)
<i>BTI</i> × <i>PRO</i>	0.010*** (0.003)	0.005* (0.003)	-0.000 (0.003)	0.007*** (0.002)	-0.003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FE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省份FE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行业FE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7 467	320 447	320 175	482 508	10 906
R ²	0.864	0.872	0.872	0.856	0.928

七、结 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如下:首先,强化银税互动政策的信息互联共享机制建设,深入挖掘税务信息,推进建设一个整合税务、金融贷款等信息的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当前税务局提供的企业纳税信息仍然存在颗粒度较粗,不及时不充分的问题。为了能让金融机构低成本获得更全面、更及时的企业信息,可以鼓励税务部门提供更为细化的税务数据,分享增值税发票、退税、社保缴费等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纳税信息,助力商业银行丰富信贷风控模型,发展新型信贷。

其次,加强银税互动政策宣传力度,不断扩大银税互动的公众知晓度。一方面,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活动能够加深小微企业对于金融政策的认知,提高银税互动信贷产品在小微企业中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在了解银税互动“以税增信”的激励机制后,有动力通过诚信纳税的行为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小微企业的税收遵从度,有助于实现政策良性循环。

最后,中国政府推行的“银税互动”政策,在探索如何主动提升小微企业税收遵从度的道路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实践。它不仅为中国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更为世界范围内解决小微企业逃税难题开辟了新的思路。在未来的税收征管改革中,针对小微企业应当更加注重从促进税法主动遵从的角度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企业提供实质性的激励措施,切实破解其发展难题,最终推动小微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全面提升。

参 考 文 献

- [1] Adhikari, B., J. Alm, and T. F. Harris, “Small Business Tax Compliance under Third-Party Report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1, 203, 104514.
- [2] Advani, A., W. Elming, and J. Shaw, “The Dynamic Effects of Tax Audi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3, 105(3), 545-561.
- [3] Allingham, M. G., and A. Sandmo,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2, 1, 323-338.
- [4] Almeida, H., M. Campello, and M. S. Weisbach, “The 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Cash”,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4), 1777-1804.
- [5] Almunia, M., and D. Lopez-Rodriguez, “Under the Radar: The Effects of Monitoring Firms on Tax Complia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8, 10(1), 1-38.
- [6] Alstadsæter, A., N. Johannesen, S. Le Guern Herry, and G. Zucman, “Tax Evasion and Tax

- Avoid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2, 206, 104587.
- [7] Asatryan, Z., and A. Peichl, “Responses of Firms to Tax, Administrative and Accounting Rules: Evidence from Armenia”, Rochester,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017.
- [8] Bachas, P., R. N. Fattal Jaef, and A. Jensen, “Size-Dependent Tax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Global Evidence and Aggregate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9, 140, 203-222.
- [9] Bellon, M., E. Dabla-Norris, S. Khalid, and F. Lima, “Digitalization to Improve Tax Compliance: Evidence from VAT e-Invoicing in Peru”,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2, 210, 104661.
- [10] Bérigolo, M., R. Ceni, G. Cruces, M. Giacobasso, and R. Perez-Truglia, “Tax Audits as Scarecrows: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3, 15(1), 110-153.
- [11] Bott, K. M., A. W. Cappelen, E. Ø. Sørensen, and B. Tungodden, “You’ve Got Mail: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on Tax Evas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20, 66(7), 2801-2819.
- [12] Buettner, T., B. Madzharova, and O. Zaddach, “Income Tax Credits for Consumer Services: A Tool for Tackling VAT Eva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3, 220, 104836.
- [13] Cai, H., and Q. Liu,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7), 764-795.
- [14] Carrillo, P., D. Pomeranz, and M. Singhal, “Dodging the Taxman: Firm Misreporting and Limits to Tax Enforce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7, 9(2), 144-164.
- [15] Castro, L., and C. Scartascini, “Tax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n the Pampa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5, 116, 65-82.
- [16] 陈彪、罗鹏飞、杨金强, “银税互动、融资约束与小微企业投融资”, 《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12 期, 第 77—93 页。
- [17] DeBacker, J., B. T. Heim, A. Tran, and A. Yuskavage, “Once Bitten, Twice Shy? The Lasting Impact of Enforcement on Tax Compliance”,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8, 61(1), 1-35.
- [18] 范子英、田彬彬, “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 《经济研究》, 2013 年第 9 期, 第 99—111 页。
- [19] Harju, J., T. Matikka, and T. Rauhanen, “Compliance Costs vs. Tax Incentives: Why Do Entrepreneurs Respond to Size-Based Regul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9, 173, 139-164.
- [20] Keen, M., and J. Mintz, “The Optimal Threshold for a Value-Added Tax”,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3-4), 559-576.
- [21] Kleven, H. J., M. B. Knudsen, C. T. Kreiner, S. Pedersen, and E. Saez, “Unwilling or Unable to Cheat? Evidence From a Tax Audit Experiment in Denmark”, *Econometrica*, 2011, 79(3), 651-692.
- [22] Law, K. K. F., and L. F. Mills, “Taxe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Linguistic Cu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5, 53(4), 777-819.
- [23] Lobel, F., T. Scot, and P. Zúniga, “Corporate Taxation and Evasion Responses: Evidence from a Minimum Tax in Hondura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4, 16(1), 482-517.
- [24] Mascagni, G., A. T. Mengistu, and F. B. Woldeyes, “Can ICTs Increase Tax Compliance? Evidence on Taxpayer Response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thiopia”, *Journal of Economic*

-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1, 189, 172-193.
- [25] Meiselman, B. S., "Ghostbusting in Detroit: Evidence on Nonfilers from a Controlled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8, 158, 180-193.
- [26] Naritomi, J., "Consumers as Tax Audi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9), 3031-3072.
- [27] Pomeranz, D., "No Taxation without Information: Deterrence and Self-Enforcement in the Value Added Ta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8), 2539-2569.
- [28] Roth, J., "Pretest with Caution: Event-Study Estimates after Testing for Parallel Tren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2, 4(3), 305-322.
- [29] Shimeles, A., D. Z. Gurara, and F. Woldeyes, "Taxman's Dilemma: Coercion or Persuasion?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in Ethiop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5), 420-424.
- [30] Slemrod, J., "Tax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4), 904-954.
- [31] Slemrod, J., M. Blumenthal, and C. Christian, "Taxpayer Response to an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Audit: Evidence from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in Minneso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79(3), 455-483.
- [32] Slemrod, J., B. Collins, J. L. Hoopes, D. Reck, and M. Sebastiani, "Does Credit-Card Information Reporting Improve Small-Business Tax Compli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49, 1-19.
- [33] 田彬彬、杨健鹏、汪丹、叶菁菁, "第三方信息获取与税收征管效率:来自有奖发票推行的证据", 《世界经济》, 2021年第9期, 第103—124页。
- [34] Wilson, R. J., "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3), 969-999.
- [35] 西晓楠, "深化和规范'银税互动'的路径探析——基于湖北省'银税互动'开展情况的调查", 《税务研究》, 2023年第7期, 第32—38页。
- [36] 杨龙见、吴斌珍、李世刚、彭凡嘉, "'以税增信'是否有助于小微企业贷款?——来自'银税互动'政策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21年第7期, 第96—112页。
- [37]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 "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 《经济研究》, 2020年第3期, 第116—132页。

Bank-Tax Interaction Enhances Tax Compliance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PENG Fanjia WU Binzhen

(Tsinghua University)

YANG Longjia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I Shig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Finding sustainable ways to enhance tax compliance among SMEs is a global challenge. The Bank-Tax Interaction (BTI) program rewards firms with good tax credit through increased bank loans, reflecting a reward-over-penalty principl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BTI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MEs tax compliance, with stronger effects in firms in regions with stronger policy promotion, those with non-A-grade tax credit, smaller size, great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non-SOE status. Thes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incentives to promote tax compliance,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innovative tax administration strategies that leverage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and market forces to incentivize voluntary compliance.

Keywords: small & micro enterprises(SMEs); tax compliance; bank-tax Intera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H26, H32, H83

*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Shigang,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Fina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82; Tel:86-15084775705; E-mail:lishigang@sysu.edu.cn.